

历史的悖论与民族国家想象

——论战国策派的民族国家表达及其意义和局限

徐 勇

提要: 战国策派是抗战期间勃兴的一个政治文化派别,本文拟从民族国家想象和民族主义叙述的角度,力图发掘其对中国历史的清理和抗战建国的论述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及独创处,尽量给其以合乎历史的评价。他们以欧西民族国家的历史返观中国的战国时代,既看到民族国家建国的必要,又注意到民族国家将导致战争不可避免的弊端,这是他们十分深刻的地方。同时他们又提出改造国民性的迫切,但其主要途径是通过回到战国时代从中发掘出“力”的一面,这又与鲁迅等提出国民性的内涵明显不同。他们提出抗战建国,但又带有明显的贵族色彩,而他们从民族国家的角度重构中国历史,也可视为回应现实的一种诉求,等等这些都使得战国策派既富有活力又充满争议。

关键词: 战国策派 民族国家 认同及叙述 循环史观

作者徐勇,男,西华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北京 100871)

1940年,当抗战已进入相持阶段时,林同济即以“战国时代的重演”说而令时人为之侧目,他把当代称之为“世界史上的战国时代(可把它叫做‘大战国时代)”,而“中国文化的发展,早已踏过了它的战国阶段而悠悠度过了二千多年的‘大一统’的意识生活”。因此,要在“战在歼灭”的大战国时代求生存,“我们须要‘倒走’二千年,再建起‘战国七雄’时代的意识与立场,一方面在重新策定我们内在外在的各种方针,一方面来仔细评量我们二千年来的祖传文化!”^①林氏是战国策派的重要成员,该派把当代世界史比附为中国古代的战国时代,已明显跳出欧洲文化中心的框架。^②但

民族国家是晚近才有的现象,战国策派诸人当然清楚。^③而要以民族国家的历史去重新阐释战国时代,其间的矛盾和裂痕自是难以缝合并时有显现,这些却很少为研究者所关注。此外,因其浓厚的政治色彩及在理论上与尼采等权力意志论思想的联系,战国策派曾一度被视为带有法西斯色彩的反动派别;^④此类观点也一直左右并限制了对其进行的研究,至近十多年来状况才有所好转。基于此,本文的写作将从战国策派的民族国家表达和叙述入手,力图发掘其对中国历史的清理和抗战建国的论述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及独创处,以达到对历史多重丰富性的认识。

^①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温儒敏、丁晓萍编:《时代之波——战国策派文化论著辑要》(以下简称《时代之波》),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第54、59、60页。

^② 参见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99页;杜赞奇也指出了战国策派代表作家雷海宗的“向欧洲历史叙述结构霸权行为挑战”的一面,见[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40页。

^③ 雷海宗把国家主义即民族国家视为“西洋文化第三期的产物”,参见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91—292页;而林同济对西洋列国时代的分析也是以近现代为时间上限的,参见《时代之波》第34—38页。

^④ 参见陈安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636—644页。

一、叙述民族国家：从对线性历史的超越开始

对历史分期的叙述是战国策派最为重要的工作之一，表现在时间观上，即对所谓线性发展的社会进化论史观的超越。“在对历史发展的认识上，它（指的是战国策派提出的“文化形态史观”——引注）主张文明发展具有共时态，否定超文化的全人类社会‘阶段论’”；^①线性“阶段论”式的时间观决定了其在理性上不能对过去及传统有丝毫的留恋，最为典型者莫过于“五四”时期激进的反传统思潮。虽在感情上不必也不可能与传统完全隔断，但这也使得其对过去及传统缺乏应有的包容和客观，无怪乎当时有“学衡派”等起而攻之。而后起的“战国策派”显然也延续了“学衡派”对“五四”的批判，其对线性历史阶段论的否定，也一度被误认为“宣扬抗战时期是‘战国时代的回复’的‘历史循环说’”。^②战国策派诸人的确鼓吹过“战国时代的重复”说，但不能以“历史循环说”概括之。殊不知他们还提出了历史发展阶段论说，故只有把这两种观点联系起来才能对其时间观有一个较全面的理解。

在谈到历史分期时，战国策派提出了一重要概念——“文化形态”或“历史形态”说，他们反对文化/历史一元论，林同济说“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文化是分有若干体系，布在各个空间时间的”；^③雷海宗也认为“文化既是个别的……每个文化都有它自然发展消长的步骤”^④。但各文化仍有“历史发展大步骤的公同点”，“这个公同点，就是历史的形态”。^⑤在他们看来，每一“文化形态”都须经历一文化发展的周期，即“封建阶段”、“列国阶段”和“大一统帝国阶段”，^⑥之后便是衰亡，即“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⑦也就是说，各“文化形态”都必经历这几个阶段的发展，惟因其自成体系，在时间上才不一致，而对那些生命力弱者，则可能在经历第一周后消亡，“埃及”和“巴比伦”“帝国”即

此，对那些生命力强者却能在衰亡期迎来另一周的发展。西方正处于第一周的列国阶段至大一统帝国阶段，而中国则经历了文化上的两周，正位列“传统政治文化总崩溃的时代”，^⑧接近于“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在这里，战国策派虽注重对历史的分期，但其思考的起点却在于，中国能否迎来历史文化的第三周？抗战在这文化重建中的意义如何？

已有学者注意到此说之渊源，即德国历史哲学家施宾格勒及其著作《西方的没落》一书。施氏代表一典型的历史宿命论，他认为每一文化都要经过生、长和衰亡三阶段，西方无疑正走向不可挽回的没落；而雷氏“在借用施宾格勒历史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独特的中国史观，即‘中国文化独具二周’论”。^⑨可见，战国策派提出“战国时代的重演”并非简单的“历史循环说”，毋宁说是社会进化的历史循环论，其对“五四”以降以进化论为代表的线性时间观^⑩无疑是一补充，因为在传统理解的进化论时间观中，出生、生长和衰亡之间泾渭分明，不容混淆，而一旦中国历史具备文化的“二周”即可证明传统仍有价值所在，故此，对其重新利用和改造就成为可能而必须了。一个文化既然有生老病死，病态已然显示出来，而中国文化“独具二周”又足证明传统之力量所在，因此，如何从传统文化中吸取力量而批判其病态就成为战国策派文化重建构想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其提出“战国时代的重演”说所显示出的意义及局限也正是在此层面被凸显出来。

二、抗战建国：如何重建及其民族主义表达

（一）民族、国家及民族主义叙述

战国策派诸人其实早已注意到，民族和国家并不能等同。林同济指出“民族主义……乃都是任何文化体系发展到列国时代所多少必有的东西”，他提出作为“社会现象”和“政治主张”的不同的民族主义之说，即

① 魏宏运：《战国策思潮研究序》，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序6页。

② 陈安湖主编：《中国现代文学社团流派史》，第637页。

③ 林同济：《形态历史观》，《时代之波》，第6页。

④⑤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40—141、163、160页。

⑥ 雷海宗：《历史的形态与例证》，《时代之波》，第15页。

⑦ 也称为文化发展“三个阶段”说，参见林同济：《形态历史观》，《时代之波》，第7页。

⑧ 而雷海宗则提出了五阶段说，即“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和“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参见雷海宗：《历史的形态与例证》，《时代之波》。

⑨ 参见丁晓萍、温儒敏：《“战国策派”的文化反思与重建构想》，见《时代之波》，前言第6页。

⑩ 这种时间观表现在严复翻译赫胥黎《天演论》时的改动。“由于略去了进化中出现的退化及周期性循环内容，进化成为向同一方向的不断前进、日新月异，由此出现了以时间先后作为价值判断的标准”，见林基成：《天演=进化？=进步？——重读〈天演论〉》，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上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第29页。以此论之，战国策派在一定意义上是复原了进化论的复杂内涵。

已触及到此问题。^① 这里, 关键不在于民族主义和国家的形成与区别, 而在于他把中国的战国时代和西方的近现代统统称之为“列国时代”。如果说民族国家叙述符合西方近现代的话, 对中国古代却非如此, 林同济诸人显然有意回避了这个问题。20世纪30年代前后雷海宗在讲授《欧洲通史》时, 就已注意到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 他把“民族为最高主权者”视为“国家主义”的“意义”所在, 而国家最首要的特征正在于“统一的民族”。^② 但从他40年代前后的论述中却几乎找不到中国作为民族国家的表述。

现代民族国家虽始自近现代, 但并不妨碍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从古代中国吸取现代民族国家的资源。杜赞奇曾指出: “民族既存在于历史之中, 又在其终结之处。它既是穿越历史的本质(虽然具体细节散失殆尽), 又游离于历史的控制之外。……作为历史的主体, 民族必须天天复制、复原民族本质的工程, 以稳固它作为无所不在的民族空间的透明度, 尤其是在面临内部及外部的挑战的关头。”^③ 对战国策派而言更是如此, 他们既要建构民族的本质, 又要进行民族衰败与当前重建的必要性叙述。如杜赞奇所言: “民族国家一方面歌颂民族古老的、永恒的特性, 另一方面又努力强调民族国家的空前性, 因为只有这样人民—民族才能成为自觉的历史主体。”^④ 战国策派诸人把民族/国家视为一体两面的存在, 与其说仅出于一策略性的考虑, 毋宁说还缘于对中国文化重建的思考。通过比较中西间的异同, 使他们看到了中国文化重建的希望, 中国自战国时始即已经历了西方当代经历的民族国家历史, 其从出现到没落的历史正好可作为当代建国的借鉴。

在雷海宗的分析中, 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是至关重要的分界线, 此前为文化的第一周, “是华夏(即‘汉族’)文化精华形成的时期, 也是中国的经典时代”; 而此后至现在, 乃文化的第二周, “这一时期, 北方胡人及佛教多次入侵, 产生了一个血统和文化混杂的新社会, 一个混杂的中国”。^⑤ 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 “二周”论既是历史分期, 也是民族历史叙述, 在雷海宗的框架中, 正是从第一周纯种的汉族到第二周胡、汉两族混合为一新的汉族, 标志中国历史文化走向不可挽回的衰败期, 这是整体趋势。若从细部看, 第二周整个的衰亡过程恰是第一周后期衰败的延续; 第二周虽有短暂的隋唐盛世, 但“在政治社会方面一千五百年间可说没有

什么本质的变化, 大体上只不过保守流传秦汉帝国所创设的制度而已”。^⑥ 故此, 雷氏倍加推崇战国时代, 但其随着秦帝国的建立也一去不返, 无怪乎中国的历史此后走向不可挽回的下坡路, 一直到抗战爆发。而与二周说相对应的, 是他对中国国民文化即“兵”之历史的叙述, 他认为, 淝水之战后出现“五胡乱华”及华夏中国(汉族)不能抵御外族, 与中国始终没有解决好“兵”的问题有直接关系。战国时期, 各国间特别是秦国实行“征兵制”, 这是典型的“全民皆兵”的“军国主义”, 以此组织起来的自然乃“国家军队”, 完全效忠国家, 他们有强烈的“爱国思想”, 军(或兵)民间不存在矛盾和仇恨。但这种情况随战国结束发生了大的改变, 秦帝国发流民当兵, “军民互相仇视”的“变态局面”也由此形成, “爱天下”的观念逐渐取代“爱国的观念”, 而随着“募兵制”的取而代之, 募兵也变为一种“职业兵”, 他们“与一般的人民自然没有多少感情上的联系。对于国家他们也很难说有多大的忠心, 不过皇帝养着他们, 他们替皇帝卖死就是了”。其结果是, 中国自此一蹶不振, 一直到文化第二周的当是时。^⑦

表面看来, “二周”说虽预设了战国时代发展的最高峰, 但这个前提又是以西方民族国家的历史作为参照和比较的, 而其所谓战国时代的重演, 并不是说中国在抗战时代回到了战国时代, 而是说世界历史进入了战国时代。这就暴露出战国策派的致命点, 即, 如果说当是时的世界大战乃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的话, 中国史上的战国时代却不是。因为显然, 在雷海宗的框架内, 战国时列国间并不是民族间的区分, 而是同一汉族内部间的分别。关于这点, 在战国策派诸人的论述中始终语焉不详, 而林同济则干脆用“种族”的概念置换了“民族”。^⑧ 看来, 问题并不在战国时代是否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 而在处于战国重演时代的抗战时的世界变局本身。既然中国历史独具二周, 足以说明中国文化虽在走下坡路, 仍具有极大的活力, 因此从战国的传统及第二周的演变中汲取资源就成为十分重要而必要的任务。所谓抗战建国, 中国文化能否迎来第三周, 其希望及重要性也正在这里。

(二) 民族主义与如何建国

战国策派诸人提出所谓“战国时代的重演”以及民族主义等等, 其目的是为了建国。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看, 其建国主张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

①⑧ 参见林同济:《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时代之波》,第32—33、34、34页。

② 参见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291—292页。

③④⑤ [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第29—30、30、41页。

⑥⑦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153、2—49页。

1. 立人与民族国家认同

所谓民族国家,其主体无疑是人民或国民,战国策派诸人当然清楚。林同济说“列国阶段照例要发生两重的基本作用:(一)它要在层级结构塌倒的残基上,布置一个‘平面化’‘平等化’的社会;而同时(二)又在这平面化社会上头,建立起若干森严对峙的政治壁垒——就是‘国家’”,这两个作用力即他一再宣称的“个性的焕发”和“国命的整合”。^①其相互冲突而互为前提,而民族主义正好是这两者的凝聚力,个人民族国家认同中的主要因素。^②这种分析,若用于现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或许有一定道理,却不一定适合中国的战国时代。而雷海宗提出“兵”的问题,其意也显然在于“全民皆兵”。这些都说明他们对国家之民——国民——问题的重视,是他们立人的构想中之一部分。

但细加分析便发现,这种构想显然存在重大矛盾,即民族国家认同问题。林同济在谈到民族主义的凝聚力时避而不谈战国时代中国的情况已表明这点,他们从战国时代寻找建国资源,但其时的民众并不具备现代民族国家认同,这样一来,其所谓“立人”只能是个体之人,而非国民之民;关于此,即使是雷海宗十分推崇的战国时代也很明显。雷氏注意到“战国时代”“一般人民中”“渐渐发生”的“厌战心理”,^③其一定意义上即民众对国家的认同感不强所致。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其提出的“爱国思想”问题上。在他看来,“爱国思想”乃“列国竞争所产生”,而一旦“天下统一”如秦帝国建立后,爱国思想便趋衰亡。这种分析,显然是以今证古的方式,其立论亦即典型的二元对立模式:“爱国志士与其说是爱本国,不如说是恨别国。恨恶别国,轻视别国,是爱国观念的必须条件;要不然,爱国观念就必渐渐衰弱以至于消灭。……爱国的观念消灭,爱天下的观念流产,人民渐多不愿入伍,结果就产生了一个麻木昏睡的社会。”^④这显然与他的其他论述互相抵牾,他论战国时代的侠士,指出“这些新的侠士并无固定的主张,谁出高价就为谁尽力,甚至卖命”。而对那些“皆兵”的“全民”也部分是受“国家威胁利诱的支配”,^⑤如“赐民爵”等等,这种以利诱使的“征兵制度”,显然与真正的民族国家认同相距甚远,出现“厌战心理”就很正常了。

2. 改造国民性

本着立人和抗战建国的主张,战国策派诸人提出

了改造国民性问题:“在一个乌烟瘴气的传统社会中,如何而可得到一批能干肯干的健康分子以为建立新国家的中心动力?”“要当改造的动力,士的本身先须改造!”^⑥但与鲁迅等新文化先驱们的立意自是明显不同,鲁迅等从西方启蒙、科学和民主等思想出发而提出改造国民性,其目的和途径是向传统开战;而战国策派虽也揉合了西方的启蒙、民主等思想,但其改造的主要途径却是回到战国时代,力图从中获取抗战建国的资源。其国民性思考,显然基于其对中国历史的认识,与“文化形态”三阶段说相一致。在雷海宗看来,中国自秦帝国以来即已显出衰败之势,而到了第二周更是一路衰败而来,其后只因南方文化及发展等因素的刺激才不致完全衰败下去,到了近百年,更是进入了“传统政治文化宗崩溃的时代”。他指出,第二周文化的到来,关键在于淝水之战中西晋的胜利,而能否迎来第三周,就要看当代的抗战能否坚持下去与否了。^⑦显然,他提倡“兵的文化”及其对中国历史的梳理都与此有关,其意即表现于,要以“兵的文化”来改造萎靡的国民而建成一强大的民族国家。

这种思考,集中体现在林同济提出的“大夫士”到“士大夫”的蜕变中。他注意到“士大夫”传统的萎靡不振,因此欲以春秋及战国时代的“大夫士”精神作为拯救的良方。“什么是大夫士的人格型呢?即以义为基本感觉而发挥为忠、敬、勇、死的四位一体的中心人生观”,“他是一副刚道的人格型”;而士大夫则是“柔道的人格型”。“在目前这个大战国时代,我们所急需的是哪一样呢?……我们绝不要大夫士‘制度’的复活,但我们是不是要多方设法培养出一种大夫士的‘精神’?”^⑧他们提出“力人”、“战士式”、“君子”、“英雄崇拜”等等也可作如是观。可见,他们提出国民性,其意是要改造中华民族中柔弱的、与抗战不相协调的一面。其提倡“力”的学说及“英雄崇拜”虽有揉合尼采强力意志说的成分,但显然是以民族国家建构作为前提的,这与尼采式“超人”哲学明显不同,“尼采的‘超人’是无所拘束的,他的意志就是其目的的本身。但林同济的‘战士式人格’之上,却有一个‘国’的制约。……特别是在战国时代,他特别强调不能再以个人为本位,而必须以国家为本位”。^⑨

① 林同济:《形态历史观》,《时代之波》,第9页。

② 参见林同济:《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时代之波》,第38页。

③④⑤⑦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参见第13、19、9、12、177页。

⑥ 林同济:《士的蜕变——由技术到宦术》,《时代之波》,第38页。

⑧ 林同济:《大夫士与士大夫——国史上的两种人格型》,《时代之波》,第66—68页。

⑨ 许纪霖:《林同济的三种境界》,许纪霖编:《林同济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序第13页。

三、结语：民族国家之战及其宿命

战国策派的确宣称过“民族至上”、“国家至上”之类的观点，但这些都是针对抗战建国而言的。林同济曾指出：“大争之世乃任何文化走到列国后期所终要走到之世。它与民族主义所产生的关系可说是一方面代表了民族主义在若干复杂因素中多董荡而成的最高峰，一方面也表示了由于这最高峰而产生的相反倾向。因为，一个世界性的权力形成之日，也就是民族主义消亡之日。”^①雷海宗早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讲授《欧洲史》时，也把以“侵略”和战争为主要特征的帝国主义——“大国家主义”视为“国家主义之自然结果”。^②战国时代的意义在于“全能国家”^③——即高度成熟的民族国家——的出现，而一旦出现，结果战争又不可避免。这是他们十分深刻和矛盾的地方：他们既看到“列国时代”可能走向的负面——战争的必然出现，但又必须建成与之相似的民族国家才能在其中幸存。从这点而言，与其说战国策派是在鼓吹战争，不如说他们对民族国家进行了反思：民族国家的成熟是否一定导致战争的出现，有没有可以避免的途径？

而若按照其“文化形态”阶段说，“列国时代”之后是“大一统时代”的到来，那么民族国家就只能成为一个中间物性的存在，其建国的意义何在？将民族国家视为中间物的观点，并非战国策派的独创，也并不始自战国策派，其最为典型者莫过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国家学说——其所构想的最终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到来，势必以消灭民族国家作为前提。而战国策派立论的角度显然不同，他们把民族国家视为中间物是看到了其分列必然导致国家间战争的出现，其愈演愈烈的结果当然是大一统的出现，或曰“定于一”，^④或曰“大同”世界。这种中间物式的民族国家存在，使得战国策派提出的抗战建国主张既充满了矛盾，又极富生机，其悖论和尖锐都十分明显。世界大战后若真能出现林同济所谓的“两三个超级国家的诞生”，^⑤中国又如何顺利完成建国？其民族国家于其中又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等等。雷海宗曾以中国文化的第三周作为展望的未来，

但对于建成之后如何则语焉不详甚至充满矛盾。^⑥林同济也表现得很犹豫：“民族主义的前途恐怕就在这两类型的大力国主义下取得决定。前之类型胜利（指的是希特勒的“强暴形式”——引注），民族主义将逐渐淹没。后之类型胜利（指的是“开明领导的”“罗斯福作风”——引注），民族主义或可取得一种新方式与大力国主义并行而并存。”^⑦战国策派诸人寄希望于“开明领导的”“罗斯福作风”，其意在于“求安”及和平共处，这显然与他们对民族国家的想象互相抵牾，若民族国家的出现使得列国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求安”或“并存”又如何成为可能？

战国策派提出的民族国家表达虽然矛盾重重不可能实现，但他们从民族国家的角度去重构中国历史的企图，既可看成重写历史的一种主张，又可视为回应现实的一种策略。他们“考察不同时代的文化特征时，很少顾及社会的、经济的原因，因此从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他们的立论未免有些头脚倒置”。^⑧而这其实正是他们重写历史的角度。上个世纪50年代中期已有批判者指出这种倾向，^⑨这种“反动本质”又被归纳为“雷海宗用‘生产工具发展史’的谬论来否定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⑩而若撇开其中的政治意味，客观上说，这种论述还是十分准确的。战国策派提出所谓“战国的重演”，其意义还在于重新书写了一部中国史，在这部历史中，不存在古代、近代或现代之分，这是一部关于民族的演变及兴衰的历史，民族作为历史的主体被不断建构，而被赋予新的时代意义；这对当时以阶级作为历史及现实主体的时代斗争哲学而言，不啻是一种反抗：他们以民族国家的历史来反抗阶级及阶级斗争的历史。从这个意义而言，民族国家既是他们的抗战建国的目标，也是他们思考现实的方法；而至于这种构想能否实现、如何实现以及存在的种种矛盾等问题都只有放在当时整个世界格局的演变及中国的革命进程中才能有一个综合的理解。

责任编辑：田明孝

①④⑤⑦林同济：《民族主义与二十世纪》，《时代之波》，第40—41、41、41、41页。

② 参见雷海宗：《西洋文化史纲要》，第293页。

③ 林同济：《战国时代的重演》，《时代之波》，第51页。

⑥ 雷海宗说：“此次的复兴建国，是人类史上的空前盛事，因为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一个整个文化组成真正统一的国家的现象。罗马帝国或秦汉以下的中国皆为大而无穷的庞大社会，绝非春秋战国或近世欧美的许多真正统一的一类国家。”《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第184页。

⑧ 丁晓萍、温儒敏：《“战国策派”的文化反思与重建构想》，见《时代之波》，前言第10页。

⑨ 参见孙定国：《雷海宗批判》，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16页。

⑩ 上海人民出版社编：《批判雷海宗、李鸿哲的反动史学观点》，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9页。